

杭州文博

张建庭 主编

第3辑



杭州文博

张建庭 主编



3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杭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杭州文博. 第3辑/张建庭主编. —杭州:杭州出版社, 2006.1

ISBN 7-80633-845-4

I. 杭... II. 张... III. ①文物工作—杭州市—文集②博物馆—工作—杭州市—文集

IV. G269.275.5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0828 号

杭州文博 第3辑

张建庭 主编

出版发行 杭州出版社(杭州市曙光路 133 号)
邮编:310007 电话:(0571)87997719

责任编辑 金天国

美术编辑 祁睿一

制 版 杭州钟声电子技术服务部

印 刷 浙江大学印刷厂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1/16

字 数 180 千

印 张 6.25

插 页 10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33-845-4/G·500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杭州文博》编辑委员会

主 任:张建庭

常务副主任:刘 颖

副 主 任:卓 军 高念华 徐吉军 张振常
吴胜天 胡耀清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明华 王建荣 朱晓东 李 海
杜正贤 余洪峰 吴晓力 房友强
施加农 戚水根

目 录

政策与管理

- 试论托管制博物馆联盟
——以杭州地区为例 朱晓东 (1)
- 谈文博档案的管理和应用 朱 倩 (4)

考古论坛

- 杭州严官巷南宋御街遗址发掘简报 李蜀蕾 (7)
- 浅论淳安良渚文化的年代 方明华 (13)

博物馆工作

- 谈博物馆宣教工作及加强讲解员队伍建设的必要性 张 帆 (15)
- 润物细无声
——浅谈中国茶叶博物馆的藏品征集工作 郭丹英 王建荣 (19)
- 以人为本 用心做事
——对江南水乡文化博物馆宣教工作的回顾与思考 王永翔 (23)
- 关于博物馆与旅游资源开发的思考
——以西博会博物馆为例 周 佳 (26)

史海钩沉

- 试论万松书院办学规制 邵 群 (28)
- 杭州仁爱医院旧址识读 方芝蓉 (33)
- 试论良渚文化时期的原始宗教与良渚文明 骆晓红 (37)
- 关于苏轼大麦岭题名刻石真实性的商榷 钮因莉 张 珏 (43)
- 皋园话旧 刘 方 (45)
- 杭州现存唐代金石考 陈天声 (47)

器物探研

- 有关龔公盃的几点看法 凌知易 朱祥林 (51)
- 西兴五代化度院陀罗尼经幢 王屹峰 (53)

“梅王阁”藏画所反映的历史文化内涵	洪丽娅	(55)
萧山朱氏所赠明代紫檀画桌记	陈建军	(59)

西湖学研究

15—19 世纪日本画家笔下的《西湖图》	方 忆	(61)
解放后西湖名人墓葬变迁研究	沈建中	(71)

学人风采

“小人物”发现“大文化” ——良渚文化发现者施昕更评传	王心喜	(77)
--------------------------------------	-----	------

域外之音

中国陶瓷艺术的仿古风	[英]Rosemary E. Scott 撰 盛洁桦译	(83)
------------------	-----------------------------	------

文博信息

浙江省省级文保单位拱宸桥桥面修缮工程竣工	(90)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八十八师淞沪抗战纪念牌坊进行环境整治	(90)
里万物桥桥面修缮工程竣工	(90)
杭州市开展省级文保单位“四有”档案编制工作	(91)
杭州历史博物馆推出书画和考古成就展	(91)
西湖博物馆建成开放	(91)
俄罗斯现实主义之风吹进西湖博览会博物馆	(92)
韩美林艺术馆建成开放	(93)
余杭区收藏家协会成立	(93)
中国江南水乡文化博物馆举办“走进余杭”中国画展等临时展览	(94)
新馆陈列考察之行——良渚文化博物馆派员参观姚家山遗址成果展	(94)
建德启动文保单位保护范围划定工作	(94)

征稿启事	(95)
------------	------

封面题字 鲍贤伦

试论托管制博物馆联盟

——以杭州地区为例

□ 朱晓东

一、博物馆联盟是博物馆改革的一种选择

我国的博物馆事业经历二十余年的改革和建设,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不仅在国内,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影响。但就整体而言,博物馆仍然受地区、行业和层级的分割,处于各自为战的局面,未能摆脱旧有体制的束缚。博物馆的整体效益不够理想,博物馆的建设与政府的初衷和社会的期望值有着较大的差距,博物馆游离于社会改革的边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

博物馆在改革中把自己置于社会生产关系之外,而被边缘化。计划经济体制下,博物馆是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上层建筑,随着社会改革的深入,人们认识到博物馆是一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服务机构,它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力。社会要求将博物馆置于社会生产关系中,要求博物馆依靠它生产的文化产品来和社会交流,要求博物馆融入社会生产关系中,通过竞争找到自己的定位。但是,大多的博物馆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它们把博物馆是国家的公益性事业单位理解成可以游离于社会生产关系,而只和国家行政结成关系的单位。这种游离使博物馆付出了代价,使博物馆的改革滞后,也使博物馆在改革的大潮中处于边缘。因而,博物馆的改革要将博物馆置于社会生产关系的范畴内来谋求自身的发展和对社会的服务,也就是说,要将博物馆从地区、行业和层级分割中解脱出来,将其置于整个社会的总的生产关系的范畴中,通过博物馆行业的相互竞争和协调,重新组合,形成新的生产关系,从而使其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解放博

物馆自身的生产力。

博物馆网络联盟就是一种新的生产关系。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在于:第一,将博物馆的文物资源从狭义的“国家所有”中解放出来,使它真正成为国家乃至人类所有。博物馆联盟将有可能对自己的馆藏文物在统一的战略目标下进行整合,从而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文物资源的作用,形成具有一定特色的文化产品。第二,博物馆联盟将可能在各博物馆间形成竞争机制;在联盟内,可形成较一致的行业标准和较为公正客观的行业间的评估准则。第三,博物馆联盟将为博物馆人才的流动、岗位结构的合理设置和人员的配置及更好文化产品的生产提供互补、交流和竞争的平台。第四,博物馆联盟将可能运用“运作成本”、“效益成本”等这些经济手段对博物馆加以管理。博物馆联盟将可能在更好地实现社会公益性目标的同时,探索并实现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新的现代博物馆体制。第五,博物馆联盟可有效地加快博物馆与社会改革的融合,能逐步掌握市场经济对博物馆的影响,并进一步开拓博物馆的社会服务功能。

二、关于杭州市托管制博物馆联盟的设想

在现有行政体制下,实施博物馆战略联盟依然有许多难以克服的因素,但我们必须启动这一进程。笔者以杭州地区为例,提出一种托管制的模式设想。

笔者将这一模式表达如下:在杭州地区内,经市、县、区各级政府的协商,一致将各级(类)国家举办的博物馆(纪念馆)统一委托杭州市园林

文物局管理,在统一的战略目标下,组成博物馆战略联盟。具体设想如下:

(一)各县、区政府在不改变博物馆产权、藏品所有权,保留人事编制数的情况下,按现有财政体制和标准继续支付博物馆的经费(这种支付保持现有标准,以后不再增加)。将博物馆委托杭州市文物行政部门管理。市文物主管部门统一对人事、经济和业务实施管理。县、区政府以合同的形式规定博物馆在本行政区域内应承担的任务,保留实施监督、审核的权力,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县、区政府对博物馆联盟的工作不满,可以在协商后退出联盟。

(二)博物馆联盟建立统一的领导机构。它由理事会和博物馆联盟执委会组成。

1. 理事会由市园林文物局,县、区政府委派的人员及社会有关人士组成。这是一个以改革为使命,以建立更有成效、更有活力和更有特色的博物馆网络联盟为目标的“政府+社会”式的领导机构。

理事会负责对博物馆联盟工作的指导、监督和审议;负责拓展社会筹资渠道,逐步建立博物馆联盟基金;负责对各博物馆工作和馆长的考评;负责协调和落实各级政府对各博物馆的要求。理事会必须对各级委托政府负责。

理事会负责制订联盟的总的战略目标和分目标;负责在联盟内实施各项制度改革,以建立内部的竞争机制。

理事会聘请一定数量的热心博物馆事业的社会知名人士、企业家作为理事,扩大和社会各界的联系,促进博物馆新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形成,加强社会对博物馆的监督 and 参与,使博物馆在整个社会生产关系中更加积极,更加活跃。例如,可主动与旅游业结成良好的互动关系,使博物馆旅游成为博物馆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

2. 博物馆联盟执委会。

执委会作为理事会的一个工作机构,负责在联盟这一层面的具体工作,也负责在各博物馆指导贯彻理事会的各项决定和任务。状委会必须有强烈的改革意识。它不仅要熟悉博物馆的各项业务工作,还要有市场经济的头脑,懂得市场经营,要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执委

会成员由委派和社会招聘的形式组成。由承担改革责任和博物馆联盟运作的杭州市园林文物局委派执委会的主要负责人或主要政治负责人,由社会公开招聘,也包括各成员博物馆提名,推荐参与招聘,由杭州市园林文物局考核、批准组成。

(三)博物馆联盟的财政支持。

在改革的初始阶段,各博物馆的财政支持依然不变,依然从原来的体制中获得,通过联盟一段时期的工作,如这种运作体制确实解放了博物馆的生产力,确实推动了博物馆的事业,则可考虑政府将财政支持统一起来,转移给市园林文物局统一管理,从而完成整个的体制改革。在这同时,理事会将通过政府的、社会的、企业的多种渠道,逐步建立杭州市博物馆基金。

另一方面,博物馆联盟通过对资源的整合、改造和更新自己的文化产品,通过更为有力的经营手段,使自己在整个的社会生产关系中占据一定的地位,从而获取更大的社会效益和一定的经济效益。

三、博物馆联盟期望达到的目标

(一)在体制上,将行政管理转向真正意义上的事业管理。政府对博物馆,既不将博物馆完全置于市场经济中,也不实行无条件的保护。对于某一具体的博物馆来讲,它的生存将由社会说了算,一旦社会对它投了否决票,那么,它将被其他博物馆兼并经营。政府将原来对博物馆的保护和支持转化为对区域性的博物馆事业的支持,将博物馆保护性、行政性管理转化事业经营管理。在这一管理中,不仅要充分考虑博物馆应实现的社会效益,更重要的是要将这种管理与经济规律挂起钩来。博物馆要讲经济效益,它的经济效益体现在博物馆的“效益成本”、“运作成本”等这些成本的比较和计算上,体现在花好每一分钱的理念中。

(二)通过地区性的博物馆联盟,能够最大限度地整合博物馆的藏品资源,最大限度地使用现有博物馆的设备、空间,加快人才的流动和培养。因而一方面可以降低博物馆总体的运作成本,一

方面又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从而创造出更为优秀的文化产品为社会服务。就某一地区来讲,博物馆联盟能较完整地反映出地区的历史文化的全貌、特点和内在联系。如以杭州为例,就可以更好地完善作为通史馆的杭州历史博物馆,以反映杭州的历史发展脉络。能集中各种资源的力量,特别是同一主题的异质藏品的整合,打造良渚文化、吴越文化、南宋文化主题博物馆,以更清晰地反映这些文化的产生和发展。而对其他偏小、偏散的博物馆及更小型的通史性博物馆,应在历史文化名城和优秀的生态度假旅游休闲城市这一重要的杭州发展主题和应有的城市服务态势上重新进行科学的、符合实际的调整。可以将一些历史文化保护区作为露天博物馆纳入视野,使杭州地区的博物馆更具有人文特色。通过联盟,扶持、建设这些露天博物馆,从而形成具有特色优势的杭州地区博物馆网络。

科学设置、合理布局、形式突破、服务优化、生动活泼的博物馆事业是博物馆联盟追求的目标。

四、杭州地区建设博物馆联盟条件成熟

(一)政府的支持是体制改革的关键。近年来,杭州市的文化建设屡有大的手笔,各级政府已充分认识到历史文化的重要性,对历史文化的保护和利用在全国也是名列前茅的。政府已将自己的视野从一个县、一个区和一个市扩大到更广大的范围。杭州市、县、区的地缘政治结构也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杭州大都市的创建而趋向融合。为了更大的战略目标,各级政府已能够走出局部、面向全局来考虑杭州市的文化资源的整

合和利用。

(二)杭州市的经济得到快速提升。地区型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在加快,社会更富裕,已能为文化建设和改革提供一定的物质保证。和谐的社会能以更宽容和更积极的姿态参与文化事业的体制改革。一些社会集团也乐于帮助博物馆事业的发展。

(三)杭州地区的文博事业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取得长足的进步。一大批博物馆建立起来;一批批的历史文化遗产被发现和保护,已形成了松散型的博物馆网络;一批优秀的博物馆管理人员和业务人才也已脱颖而出;为杭州地区博物馆事业改革积累了物质和人才的力量,携起手来打造具有杭州地区特点的博物馆联盟也已形成共识。

鉴于以上的认识,笔者认为,杭州市建立统一的集团型经营的博物馆战略时机已经成熟。委托制博物馆联盟是一种改革探索,是一种远非完善的模式,还存在许多问题和困难。笔者只是希望从“先有鸡后有蛋,还是先有蛋后有鸡”的哲学命题中走出来,对体制改革做些尝试,把博物馆从原来的行政管理体制中以委托的形式切割出来,交由上一级的行政业务部门,在一个新的空间和形式中,摆脱原来形式上的束缚,将博物馆作为一种生产力,置于社会生产关系中。从地区博物馆事业的总体战略目标出发,自上而下进行体制改革探索。

这种改革的前提是外部条件的成熟,它表现在:政府的支持,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趋向,交通、信息网络的完善和地方经济的保证。

(作者单位:临安市文物馆)

谈文博档案的管理和应用

□ 朱 倩

文博档案是文博单位的专业性档案,大至一个地区历史文化遗产保存状态的综合反映,小至单位个体的整体面貌,是一笔沉甸甸的历史文化财富。它的收集、整理,乃至研究、应用,是推动整个文博事业科学发展的重要基础性工作。

一、自发→自觉: 建档行为模式的本质转变

当前,有不少文博单位尤其是县级基层文博单位,往往忽视档案的收集与保管工作,没有形成规范化、制度化的工作方式,某项日常的业务工作完成后,无只字片语的记录,许多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线索也许就此流失或者中断,给今后的工作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和遗憾。因此,培养文博单位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及时建立档案、保存档案的意识,逐步使该项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使自发的建档行为转变为自觉行为,是文博单位档案管理和应用的前提所在。

二、分散→集中: 提供承载条件

档案与资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档案是各个单位或个人在从事各项工作活动中自然形成的,作为本单位工作活动的真实记录,并且具有一定查考凭证价值而归档保存起来的各类单份的或成套的文件材料;凡不是在本单位工作活动中形成的,并且不记录和反映本单位工作情况,只是为本单位工作起参考作用而收集的各种材料,就是资料。^①档案是文博单位重要的有机组成部

分,如果这一部分缺失或者不健全,将使一些具体工作难以开展或者深入,如文物保护单位的维修、陈列展览的设计方案以及科学研究工作。但在业务活动中形成的大量文件材料,往往处于分散的原始状态,滞留于建档部门或者个人,不利于信息资源的共享和利用。

现实条件确实制约着某些文博单位,使其不可能全都设立独立的档案室和资料室。根据实际情况,可以把档案室和资料室合并,指定一处相对固定的场所,委派工作人员,配备简单的橱柜和温、湿度控制装备,以及采取必要的杀菌、防蛀等措施,档案和资料两者分别收集,按类存放,一个小型的信息中心就建立起来了,文博单位工作人员可以从中各取所需,这种方式还是切实可行的。

文博档案随着时代的发展,也产生了多种载体形式,如数码照片、声像带、光盘、软盘及实物等,对它们的保存条件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条件较为成熟的单位可以专门配备电脑,安装档案管理软件,从而大大提高档案的整理、查找、利用效率,使档案资料室真正成为大家共享的信息中心。

三、混乱→明晰: 明确档案类别及相关人员

《文物保护法》、《文物保护法实施细则》、《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四有”工作规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等法规和实施细则中,明确提出要建立“文物档案”,并规范了形式,在文物档案的收集整理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从专业

档案角度来分析,缺少建立档案的分类、搜集、排列、编目、装订、入库等一系列规范运作程序。目前,存在着或以完成任务为目的,各类档案混杂处理,草草了事;或因相关责任人员不明确,档案分散甚至根本不建档的情况。因此,必须明确文博档案的类别及归档人员(见下表),再由相关的负责人把档案送交到档案资料室,改变分类混乱、归档人员不明的局面,有利于档案的使用和文博单位的长远发展。

文博档案的类别、范围和归档人员表

类别	范围	归档人员
文书	党群、行政工作中形成的有关文件材料	行政人员
业务	不可移动文物类: A. 文博单位 B. 文物点 C. 一般文物 D. 项目调查	文保部
	可移动文物类: A. 一级品 B. 二级品 C. 三级品 D. 一般文物 E. 标本	藏品部
	考古类: A. 考古调查 B. 考古发掘	考古部
	陈列展览: A. 策划方案、制作 B. 陈列形式 C. 陈列内容 D. 效果反响	展览部
	科研成果类: A. 科研项目、课题 B. 考古调查、发掘报告 C. 学术论文及著作 D. 管理类文章	档案资料室
后勤保障	基建类	基建部门
	设备类	后勤部门

四、传统→现代: 引入先进的数字化管理模式

运用计算机来管理是今后文博档案管理模式的一个发展趋势。当前已有越来越多的文博单位配备了计算机、数码相机、数码摄像机、扫描仪、刻录机等现代化办公设备,为文博档案的数字化管理提供了较好的硬件设施;而针对文博档案管理的软件也纷纷出现,如藏品管理系统、档案管理系统软件等。现实的状况使传统的档案制作形式仍然保留,但我们应该看到现代化的数字技术为档案的制作和查找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方便和快捷。光盘等新的档案载体还具有不易损毁、保管要求不高等优良特性,逐渐使传统的以手工为主的档案制作方式向现代化的数字化管理为主的档案制作方式转变。

文博单位可以根据自身不同的特点进行硬件与软件的添置、升级和改造。各地新博物馆场馆建设方兴未艾,如果在规划设计的初期,就考虑到今后数字化管理的发展走势,不仅仅是停留在办公自动化的初级阶段,而把网络与档案系统数据库共享以及陈列的多媒体展示,甚至为数字化博物馆等较为超前的设想都预留空间,将杜绝部分社会资源浪费、重复建设的现象,给博物馆甚至整个社会的长远发展带来极大裨益。

当然,管理模式的转变离不开至关重要的一环——人。必须有掌握数字化应用技术的人才,这种转变才能真正实现,否则,再先进的技术设备也如空中楼阁。因此,必须加大人才引进的力度,设立必要的培训机制,积极创造培训机会,鼓励单位员工学习和应用现代化的计算机技术。

五、简单→复杂: 从收录档案到研究、利用、更新

文博档案资源是宝贵的历史财富,上文对文博档案管理方式阐述的最终目的,是使文博档案转化为一种可以为大众服务的信息资源,而不是束之高阁,不发挥其应有作用。但在目前的文博单位,尤其是县级基层单位,文博档案大部分还

停留在简单收录阶段,很少进行研究、利用,甚至更新,这种简单的收录方式必须改变。

大部分的文博单位都承担着科学研究的功能,对文博档案的深入研究不仅仅是发掘所记载文物本身的价值,有时甚至可以改写一段历史。研究也是一项必需的基础性工作,文博单位的许多后续性工作也必须依靠文博档案的研究成果来进行。大到一个地区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规划的筹划、制定,小到一件博物馆展品说明牌的制作,都离不开文博单位工作人员对文博档案的研究。

文博单位尤其是博物馆作为学校课堂的延伸,承担着提升社会大众人文素养的教育功能。作为一项公益性事业,必须最大范围地贴近社会民众,拉近博物馆与观众的距离。许多博物馆在近年来改造展馆设施,改进陈列手法,加大宣传力度,制作或者引进了许多优秀的陈列展览,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但是,仍有不少博物馆存在着门可罗雀的现象。因此,是否可以采用其他途径对博物馆的资源进行展示,甚至资源的共享,也是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问题。基于网络的数字化博物馆,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方向。数字化博物馆摆脱了传统意义上博物馆所必需的建筑、陈列、参观时间等条件的束缚,打破

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使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够获取所需的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信息,它将使传统博物馆的文物管理和信息查询发生巨大的、根本性的变革,使之成为一个传播知识、获取信息的互动交流窗口。^②当然,这个信息平台是建立在文博档案的基础上的,是对其进行的有效开发和利用。

在市场化的今天,还可以考虑文博档案的有偿使用。如文博档案用于商业化途径,文博单位当然有权依法保护知识产权并获得其产生的经济效益,这样可以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使文博单位的运营更加顺畅。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水平的提高,文博单位的发展,文博档案必将得到不断的补充和更新,而这种更新同时又为文博单位的创新发展提供信息基础,从而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局面。

注释:

①陈文:《浅谈文物与档案》,《中国文物报》2001年8月29日。

②孟中元:《数字博物馆与博物馆的信息化建设》,《秦陵秦俑研究动态》2003年第3期。

(作者单位:杭州萧山区博物馆)

杭州严官巷南宋御街遗址发掘简报

□ 李蜀蕾

严官巷位于杭州市上城区紫阳街道,南距南宋皇城约 400 米,北距太庙遗址约 100 米,是一条东西走向、长不过 200 米、宽约 5 米的小巷,与白马庙巷、高士坊巷成十字交叉,东接中山南路。为配合万松岭隧道东接线(即严官巷段)的道路建设,杭州市文物考古所于 2003 年 12 月至 2004 年 8 月,对道路施工范围内的地下埋藏文物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图 1)。整个发掘工作以严官巷为界,分南、北两个区进行,南区包括 T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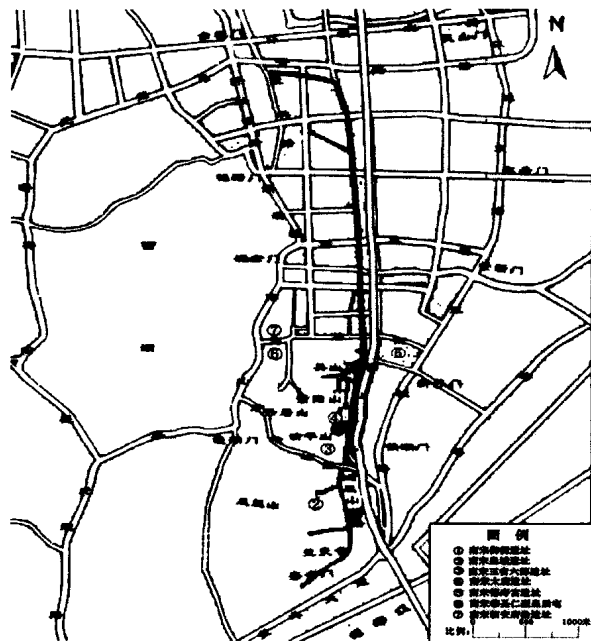


图 1 严官巷南宋御街遗址位置图

T3、T5,北区包括 T2、T4、T6,共发掘 1200 余平方米,发现了南宋御街、御街桥堍和桥墩基础、道路、殿址、围墙、河道、石砌水闸设施以及元代石板道路等重要遗迹。

一、地层关系

整个遗址的地层堆积基本一致,可分为六个不同时期的文化层,现以 T4 北壁为例加以说明(图 2):

第一层:近现代扰土层。厚 29—35 厘米,土色黑褐,土质较松,内含大量近现代建筑瓦砾等遗迹和遗物。

第二层:明清文化层。距地表深 22 厘米,厚 65—90 厘米,灰褐色土,土质较硬,土中夹有大量断砖碎瓦以及青花瓷片等遗迹和遗物。

第三层:元代文化层。距地表深 100 厘米,厚 50—82 厘米,土色黄褐,土质稍硬,内含大批断砖碎瓦以及龙泉窑青瓷碎片等遗迹和遗物,有的断砖碎瓦有火烧红的痕迹。

第四层:南宋晚期文化层。距地表深 157 厘米,厚 55—110 厘米,土色灰黑,土质较松软,出土遗物有青瓷、黑瓷、青白瓷片等,在砖砌路面遗迹上以及断砖碎瓦中也有火烧的痕迹。

第五层:南宋中期文化层。距地表深 230 厘米,厚 0—70 厘米,土色灰黄,土质稍硬,内含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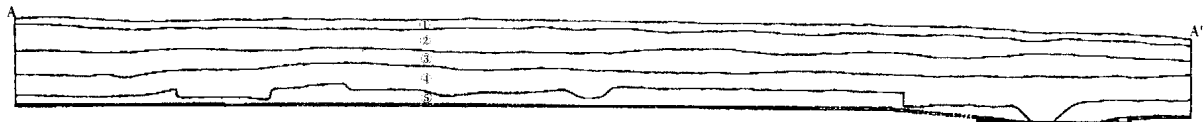


图 2 严官巷南宋御街遗址 T4 北壁剖面图

白瓷、黑釉瓷的碎片以及建筑构件等遗迹和遗物。

第六层:南宋早期文化层。在解剖本探方东北隅地层时发现,距地表深 287 厘米,为黄色夯土遗迹,厚 135 厘米,在第六层继续下挖,距地表深 422 厘米,黄土为生地(海相潮边土粉砂土)。

二、建筑遗迹

(一)元代文化层中的遗迹

该层遗迹仅在 T1 内距地表 178 厘米深处发现石板道路遗迹 1 处。道路呈东西走向,贯穿 T1,两端尚压在地层中,揭露长度 282.5 厘米。路面用规格 $115 \times 50 \times 12$ 厘米的石板平铺而成,分南北二列,北列为横向平铺,南列为纵向平铺,地势较北列稍高,两列间距 5—45 厘米。

(二)南宋晚期文化层中的遗迹

该层遗迹发现了殿址 2 处,石砌储水设施遗迹 1 处。

1. 一号殿址(图 3)

位于 T6 的西半部,距地表深 195 厘米,揭露面南北长 55 厘米,东西宽 153 厘米,其南、西、北三面尚压在地层下。

(1)大殿后檐廊遗迹:仅揭露了后檐廊的东半部,宽 10 米,残存柱础石 4 块。推测大殿面宽五间,周有围廊。自东向西第 3—4 块柱础石中心点相距 3.45 米,应是大殿当心间面宽;第 1—3 块柱础石板中心点距 7 米,应是大殿东次间和东尽间的共同面宽。

(2)过道和边门遗迹:过道位于天井之东,东厢房与后檐廊之间,东西向,长 6.95 米,宽 3.5 米,长方砖铺地,东有边门遗迹。

(3)东厢房遗迹:位于天井之东,揭露面宽 80 厘米,进深 625 厘米(前后两间),有柱础石 3 块。墙体用长方砖错缝平砌与过道分隔。

(4)天井和排水沟遗迹:天井已揭露部分南北长 3.45 米,东西宽 7 米,泥底,周围砌台阶。下部用条砖错缝平砌,上用压栏石压筑。水沟位于天井南面,宽 45 厘米,与天井东南隅暗沟交汇后,通过过道底部的暗沟,可将废水排入中河。

(5)砖座遗迹:平面呈长方形,长 75 厘米、

宽 57 厘米,残高 34 厘米。残存底座、下枱和束腰三部分。底座为青砖铺设的平台。下枱上下共三层,有收分结构,用青砖砌筑,四足均雕刻花纹。束腰由表面刻有如意头花纹的青砖竖砌,做工精致。

2. 二号殿址

位于 T4,南宋御街的西侧,由门楼、主道、副道、水井与窰井等遗迹组成。

(1)门楼与主道遗迹:门楼揭露部分长 11.55 米,残宽 1.8 米。北端尚压在地层中,建筑台基分东西对称的两部分,门洞宽 318 厘米。主道呈南北走向,揭露部分长 810 厘米,宽 342 厘米,由特制“香糕砖”侧砌而成,制作十分考究,近门洞处有明显的火烧痕迹。

(2)副道遗迹:呈东西走向,揭露长度为 10.4 米,宽 1.57 米。向西与主道交汇,由特制的“香糕砖”侧砌而成。两侧有砖砌排水沟,制作十分考究。

(3)水井遗迹:位于主道东侧、副道的北侧,直径 55 厘米,井壁与井口均由大型长方形青砖侧砌而成,井口上方有白色压栏石。

(4)窰井:上有边长 30 厘米的方形窰井盖,窄平沿,中部下凹,有 5 个下水孔。

3. 石砌储水设施遗迹(图 4)

位于 T1,在南宋围墙的北侧,由储水池、水闸和水渠组成。储水池平面呈方形,边长 310 厘米,深 352 厘米,由长方形的红褐色砂岩条石平砌而成。其底部环绕着一道石砌台阶,池内紧靠南侧台阶处有 6 根木桩固定。储水池底部有自然泉眼,至今泉水仍汩汩不绝地从地下涌出。闸门位于储水池东侧,由 2 块高 215 厘米的条石竖立而成,闸口宽 135 厘米。条石内侧对称凿有横竖凹槽,应是放置闸门的结构。水闸与东西向水渠相连,以调节水量大小。水渠共有 3 条,东水渠揭露长度为 51 厘米。两壁由条石上下错缝垒砌而成,底部铺设石板。西水渠揭露部分长 395 厘米,用不规则条石错缝砌筑而成,渠壁底部残留有护基木桩,渠底铺设石板。北水渠揭露部分长 105 厘米,内宽 62 厘米,渠壁用方形块石错缝叠砌,渠底用规格 $28 \times 8 \times 4$ 厘米的条砖纵向并列侧砌。整个储水设施设计科学,营造考究。

(三)南宋中期文化层中的遗迹

该层遗迹包括道路遗迹 1 处,围墙遗迹 1 处,河道遗迹 1 处。

1. 道路遗迹

位于 T4,呈东西走向,东端与御街辅道垂直相交,其东端直接砌筑于御街西侧的辅道上,并一直向西延伸,揭露部分长 38 米,宽 3.1 米,其西部尚压在地层中。用“香糕砖”并列横向错缝侧砌,并用连续纵向侧砌“香糕砖”两皮作为包边,局部地方用“香糕砖”并列纵向侧砌作间隔。

2. 围墙遗迹

位于 T1 的东部,东西向,其上部已部分破坏,残高仅 0.5 米,揭露部分长 32 米。墙体筑于河道南驳岸顶部一块块琢磨规整的乳白色石料之上。这些石料都产自杭州本地,俗称“太湖石”。墙体宽 122 厘米,较太湖石基础内收 15 厘米,其砌法是用规格为 $27 \times 17 \times 7$ 厘米的长方形青砖纵横相间,平砌 3 层,高 23 厘米,然后再在它的内侧和外侧各砌单皮的长方形青砖,并用泥土填实其间隙。由于受发掘场地的限制,围墙的两端尚压在地层中。

3. 河道遗迹

位于 T1 东部,紧靠围墙遗迹的北侧,与围墙平行,揭露长度 8.8 米。河道之南侧驳岸由红褐色的砂岩石块垒砌而成,揭露高度 1.1 米,底部外侧是一层经过夯筑的黄土,夯土层用大小接近的河卵石铺底。驳岸顶部的长方形压栏石由一块块琢磨规整的乳白色太湖石平铺而成,做工考究,上压围墙。

(四)南宋早期文化层中的遗迹

1. 道路遗迹(图 5、图 6)

位于 T4 东端,距地表深 2.7 米,御街位于严官巷东段北侧,紧靠中山路,与中山路走向完全一致,为南北走向,其东、南、北三面尚压在中山路之下。御街揭露长度为 10.2 米,揭露宽度为 7.2 米,分主道和辅道两部分,南侧还有桥堍与桥墩遗迹。揭露出的主道部分宽 2.05 米,用 $30 \times 8 \times 4$ 厘米的香糕砖并列横向错缝侧砌,西侧用规格 $37 \times 17 \times 7$ 厘米的大砖纵向、横向各侧砌一皮,宽 0.45 米,作为包边并与西侧辅道间隔。清理出的西侧辅道宽 5.15 米,主体分为南北向

并列三段,路面用 $30 \times 8 \times 4$ 厘米的“香糕砖”纵向错缝侧砌,长度均在 2 米以上。每段之间均以一道横向的砖结构作为隔断,该砖结构是由中间纵向侧砌的单皮小砖与两侧横向侧砌的 1—3 皮小砖构成。

2. 桥堍和桥墩基础遗迹(图 7、图 8)

位于 T4 的东南隅、御道的南端,距地表深 2.80 米。桥堍遗迹从御街主道开始,用规格 $38 \times 18 \times 7.5$ 厘米的大砖,砌成阶梯状,第一级高 15 厘米,第二级高 35 厘米。其下部竖以木桩,尚存 12 根,直径 12 厘米,间距 20—50 厘米。桥墩基础与桥堍相距 0.95—1.4 米,用长 120 厘米、厚 15 厘米左右的石条错缝平砌。其下部也竖有木桩,直径 12 厘米,间距 20 厘米左右。

三、出土遗物

(一)元代文化层出土的遗物

在该文化层中出土了大量瓷器碎片,主要是龙泉窑青瓷片,可辨器型以碗、盘为主。标本 T1③:15,龙泉窑青瓷葵口杯,口径 9.2 厘米,高 5.2 厘米,底径 3.1 厘米,敞口,小圈足,深腹,满施青釉,出白筋,圈足底无釉处呈朱红色(图 9)。

(二)南宋文化层遗物

按照质地,该层出土的遗物可以分为陶器、瓷器、铜器等。

1. 陶器

(1)建筑构件 以砖为主,包括大砖与香糕砖,此外还出土了较多的屋顶构件,包括板瓦、筒瓦、瓦当、鸱吻以及伽陵频迦等。

大砖 泥质灰陶,大而厚重。标本 T4⑥:3,长 43 厘米,宽 19 厘米,厚 8.5 厘米。

香糕砖 泥质灰陶,形制规整,长 28—30 厘米,宽 8 厘米,厚 4.5 厘米,形似年糕,是铺设路面的主要材料。

板瓦 截面呈四分之一周的弧度,一端大,一端小。标本 T4④:59,泥质灰陶,长 27.5 厘米,宽 19.5—25 厘米,厚 1.7 厘米;标本 T4④:60,泥质红陶,重唇,大端唇部作出凸菱形花边,宽 16 厘米,残长 18 厘米,厚 1.4 厘米。

筒瓦 泥质灰陶,截面为半圆形,瓦背素面,

瓦沟饰布纹,瓦身尾端作成小而薄的唇。标本 T4④:65,通长 32 厘米,直径 14.9 厘米,厚 1.7 厘米,其中瓦唇长 2 厘米,直径 12.9 厘米。

瓦当 圆形,以泥质灰陶为主,泥质红陶较少。当面装饰的主体纹样包括龙纹、莲花纹、菊花纹、牡丹纹等。标本 T6④:6,龙纹瓦当,直径 15 厘米(图 10)。标本 T4④:113,莲花纹瓦当,直径达 23 厘米,形体如此硕大的瓦当在临安城考古中尚属首次发现,即便在全国范围内也不多见(图 11)。

鸱吻 标本 T4⑤:20,泥质灰陶,瞠目龇牙,顶部有一樨眼,长 30 厘米,宽 18 厘米,高 21 厘米。

伽陵频迦 人首鸟身,出土数量较多,大都身首异处。标本 T6④:9,表情细腻,是一面容慈祥、双手于胸前合十的女性形象,背负双翅,腹部中空,高 26 厘米(图 12)。

(2)灯座 标本 T4④:30,泥质灰陶,仅余底盘与中轴,轴的上端残,残高 35 厘米。

2. 瓷器

瓷器数量非常大,既有日常食器,以碗最为常见;也有陈设器,如香炉、瓶、各种塑像等。官窑、龙泉窑、越窑、景德镇窑、定窑等诸多著名窑口生产的瓷器均有不同数量的出土,其中不乏精品。

官窑瓷 在二号殿址附近出土了不少南宋官窑瓷器。标本 T4⑤:35,官窑洗,口径 15 厘米,底径 10 厘米,高 5 厘米(图 13),胎体轻薄,施釉均匀,造型端庄,反映了皇室专属瓷窑的高超制瓷工艺水平。

龙泉窑青瓷 出土数量最多,无论是香炉、葵口杯、瓶还是碗,均釉色莹润,制作精美,有的甚至可与南宋官窑器相媲美。标本 T4④:75,瓶,长颈,造型优美,釉质温润,口径 6 厘米,底径 6.4 厘米,高 16.2 厘米;标本 T1④:1,碗,口径 16 厘米,底径 5.3 厘米,高 5.5 厘米(图 14),口沿与腹壁上有明显的修补痕迹,称得上是我国较早的补碗实例。

景德镇影青瓷 比较常见,胎骨轻薄,包括盘、瓶、炉、塑像等器型。标本 T2⑤:6,八卦香炉,口径 11.7 厘米,高 9 厘米(图 15),胎骨洁白,

器壁薄可透光,釉面有细碎开片,外壁模印一周八卦纹,下承三个兽面蹄形足。此外有不少动物、人物造型的瓷塑,如影青狮子像、影青人物像等,其质量在当时的景德镇窑产品中也属上乘。

定窑白瓷 标本 T2④:1,盘,敞口浅腹,薄胎,芒口,内底饰双鱼纹,内腹饰荷花等花草纹,近口沿处装饰一圈回纹,口径 17 厘米,底径 5.6 厘米,高 3.5 厘米(图 16);标本,碗 T2④:7,薄胎深腹,口沿镶嵌银釳,外腹有稀疏的刻划纹。

越窑青瓷 标本 T2④:5,瓶口径 8.4 厘米,底径 6 厘米,高 18.4 厘米。

四、结语

(一)发现南宋御街及其相关遗迹,确定南宋临安城中轴线

在南宋早期文化层中发现的道路遗迹、桥堍与桥墩基础遗迹均与南宋御街关系密切。从目前发掘情况来看,该道路的主体部分与中山南路完全重合,如果按其走向继续往北延伸,则会从南宋太庙的东门经过(该遗址已于 1995 年被发现并确认)。根据《咸淳临安志》所附的《皇城图》(图 17),只有御街从南宋太庙东门前经过。因此,该道路遗迹很有可能就是南宋御街。

御街又称“天街”,专供皇帝车驾通行,以显示和维护封建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威。它南起南宋皇宫北门——和宁门外(今万松岭南侧的凤凰山脚路口),经由朝天门(今鼓楼),北达余杭门(今武林门一带),贯穿了整个南宋临安城。南宋临安城的东西向大路大都是以御街为中心,再向东西两边延伸并沟通临安城诸城门,从而构成御街为中轴线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御街(特别是和宁门至朝天门这一段)两侧分布着许多南宋朝廷的重要机构,三省六部、太庙、五府以及玉牒所等。据《武林旧事》等文献记载,南宋御街的两旁商肆林立,诸行百市样样齐全,繁华一时,“无一家不买卖者”。这都体现出御街作为南宋临安城中轴线的重要地位。

尽管严官巷南宋早期文化层发现的这条道路遗迹的主道被现在的中山路所叠压,道路的全貌与完整宽度暂时无法确定,但从目前发掘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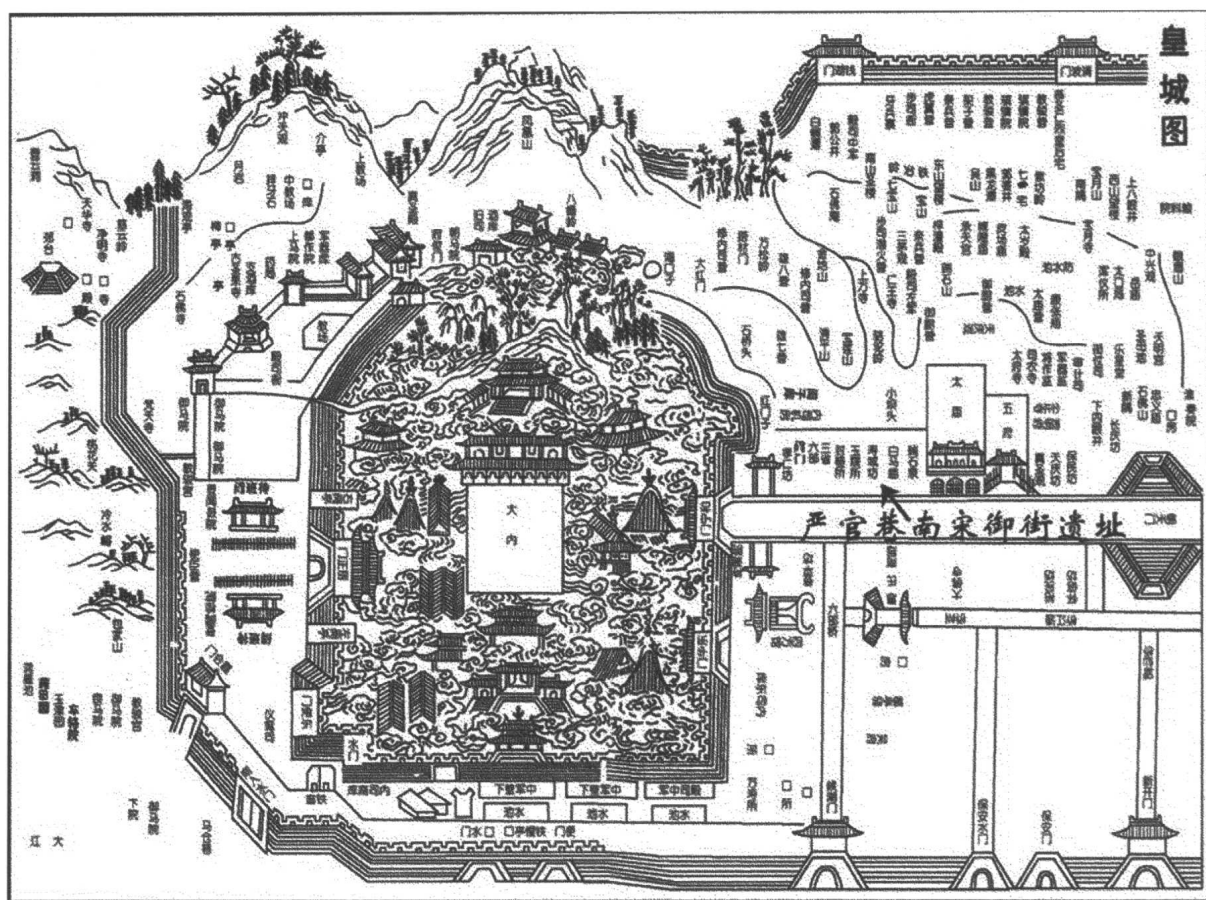


图 17 严官巷南宋御街遗址在《皇城图》中的位置

看,西辅道宽度在 5 米以上,则东辅道的宽度也应与之相当。按照常理,主道宽度应该比辅道宽,则其宽度应超过 5 米。如此算来,该道路遗迹的全宽应该在 15 米以上,其规模是相当宏大的。在以往的南宋临安城考古工作中,规模如此宏大、砌筑如此考究的道路尚属首次发现。这样的规模也正好与南宋御街的重要地位相吻合。

由此可见,在严官巷南宋早期文化层中发现的道路遗迹就是南宋御街,其南侧的桥堍与桥墩基础遗迹也应该与南宋御街密切相关。南宋御街及相关遗迹的发现是本次发掘最为重要的收获,它不仅说明,今天的中山路在走向上与南宋御街基本一致,中山路是由南宋御街逐步演变而成,至今仍为杭州一条重要的道路;更重要的是,南宋临安城的中轴线也由于御街的发现而得以确定,这对于南宋临安城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意义重大。

(二)南宋御街的发现,纠正文献记载的偏差

有关南宋御街的文献记载不多,其中以南宋咸淳四年(1268)开始组织编撰的《咸淳临安志》描述最为详尽。其卷二十一有文曰:“御街,自和宁门外至景灵宫前(今武林路凤起路口),为乘舆所经之路,岁久弗治,旧铺以石,衡从为幅,三万五千三百有奇,易其阙坏者凡二万……”这段文字主要说的是南宋修缮从和宁门北至太庙的御街的事,从中可以了解到,南宋御街是以石为建筑材料的。严官巷考古发掘所见的南宋御街是由砖砌而成,与“旧铺以石,衡从为幅”的记载有出入,可见《咸淳临安志》的记载有待商榷。

(三)其他遗迹性质推测

由于受考古发掘面积的限制,在南宋晚期文化层中发现的一号殿址与二号殿址仅揭露了局部,但丝毫不能掩饰其规模的宏大,如一号殿址的天井宽度达 13 米之多。该建筑群不但紧临南